

图书馆视角下近现代乡村宗族新公共空间的形成

——以广东江门司徒氏图书馆与关族图书馆为据

任家乐

摘要 清末民初以降,传统宗族社会走向瓦解,图书馆建设开始走向乡村。新知识社团与在乡宗族相结合,以图书馆建设为契机,重新找到了凝聚宗族人心的新方式。本文分析当时中国图书馆界对乡村图书馆建设问题认识的变化,并以广东司徒氏图书馆及关族图书馆建设为据,梳理乡村新知识社团与宗族文化的融合过程,进一步分析他们兴办乡村图书馆的动机,以及图书馆文化对乡村社会带来的多元化影响。参考文献 21。

关键词 司徒氏图书馆 关族图书馆 宗族图书馆 乡村图书馆 宗族 新知识社团

From Library Viewing Angle: Formation of New Public Sphere in Country Clans during the Period of Modern China

——Based on the Situ Chan Clan Library and the Guan Clan Library in Jiangmen, Guangdong

Ren Jiale

Abstract: The traditional patriarchal society had come to break down since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braries began to appear in rural areas. The rising intellectual clubs cooperated with rural clans by taking library construction as a new way to unite members of the same clan. This article examines the changing attitude of the library circle toward rural library construction, takes the Situ Clan Library and the Guan Clan Library in Guangdong province as cases to study the fusion of the country intellectual clubs with clans, and further analyses the motive of rural library construction, and multi-influence of libraries on rural societies. 21 refs.

Keywords: The Situ Clan Library; The Guan Clan Library; Clan Library; Rural Library; Clan; New Intellectual Club

20世纪初清末新政前后,新知识社团迅速出现于城市,并且逐步向乡村社会扩散。所谓新知识社团^[1],是由留学生、国内学堂学生以及接受西学的开明士绅为主体构成的社会群体,这一群体受西学影响颇深,有别于接受传统儒家教育、信奉学而优则仕的旧知识群体。新知识社团的成员通常是城市与乡村之间新的“连接性”人物,他们既是城市的名流,也是乡村的要角,起着引领社会风尚的作用。这些人通过创建学社、新式学校、图书馆,以及开演讲会来展示自己的主张。而同时期,面对封建制度瓦解、西学浪潮扑面而来所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化,传统乡村宗族管理

走向衰落。一方面以祠堂为中心的宗族文化需要与时俱进,吸收新的文化以凝聚人心,达到敬宗聚族的目标;另一方面新知识社团也迫切需要找到在乡村社会展示新主张的立足之地。彼此的需要促成了新知识社团与乡村宗族的结合,使宗族文化出现了“趋新”的变化,乡镇图书馆成为乡村社会新的社会中心,并转化为宗族活动的新公共空间。

学界专门研究宗族图书馆的文献不多,并且主要将之作为近现代宗族文化演化的一部分略作涉及。席婷婷的硕士论文《赤坎宗族图书馆研究》^[2]是较为全面研究这一主题的文献,但多为

史料的梳理,分析相对不足。有鉴于此,笔者拟结合民国时期图书馆界对乡村图书馆发展的认识变化,以广东司徒氏图书馆及关族图书馆的建设为据,梳理乡村新知识社团与乡村宗族文化的融合过程,分析他们兴办乡村图书馆的动机,以及图书馆文化给乡村社会带来的多元化影响。

1 近代祠堂的衰落

从原始农业社会起,人们出于生产、安全的需要,基于血缘关系形成了大大小小的宗族。西汉儒家思想取得统治地位以后,宗族制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宗族文化中,祠堂是宗族生活最重要的公共空间,是以礼制文化和孝治文化为代表的宗族文化的主要表现场所。建设和睦的宗族,常常是围绕四项内容展开的:“立家庙以荐蒸尝,设家塾以课子弟,置义田以赡贫乏,修族谱以联疏远。”^[3]立家庙、设家塾、置义田、修族谱四事,对宗族建设至关重要^[4]。四事之中,又以设立祠堂为首要任务,祠堂作为宗族的物化象征和中心机构,代表着宗族的利益和文化。祠堂虽以祭祀为主要任务,然而渐渐兼有其他功能,化作族人交际的场合和族老政治的舞台,公众意见由此产生,乡规族训由此养成。简言之,祠堂是宗族中宗教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经济的中心,也就是整族整乡的“集合表象”^[5]。在古代,不同宗族的人为争夺自然资源和生存空间常常发生纠纷,平民宗族常居于弱势地位,所以寄希望宗族子弟能够通过科举考试成为宦宦,完成从庶族到望族的转型,进而与其他同姓宗族联宗,形成更大的势力。作为宗族的社会文化中心,大姓宗族多建有供宗族子弟读书的家塾,不过祠堂通常仍是宗族子弟读书的主要场所。宗族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出外为官提升宗族地位,可使本宗族在与其他宗族的竞争中占据优势,即便这些人卸任回乡仍然作为宗族意见领袖存在,对乡村事务产生重要影响,如此完成周而复始的循环。虽然在宗族祭祀中,一般是由宗子和辈份高的族人主持祭祀,但是一些大姓宗族的祭祀活动须得既有很强的组织能

力又有较好的文学素养者才能胜任,那些文化程度不高又没有政治地位的长辈只是摆摆样子而已,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士绅学人^[6]。由此,尊重读书人、发挥祠堂的教化作用一直是作为宗族的精神文化延续下来的。

清末民初以降,商品经济活跃起来,西方国家的工业产品漂洋过海倾销到中国乡村,对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产生了很大的破坏。现代工商业创造了新的就业机会,使城市的吸引力大增,吸引大量农村人口迁徙到城市。背土离乡、距离远隔改变了以往的经济关系,令族人对宗族的依赖性降低,原本宗族文化的基础是以宗族成员与其所依附土地的密切联系为基础的,近代城市化、离乡化、废科举破坏了宗族文化出于乡而复归于乡的循环发展路径,使族人与所依附的土地相分离,部分宗族精英远离了故土,从而动摇了宗族制的根基,使宗族管理出现衰落的迹象。另一方面,虽然科举制度结束了,但是重视教育的传统没有改变,在乡族老迫切需要以教育为纽带,找到新的宗族文化认同的方式。

2 图书馆界对乡村图书馆建设的倡议与经验总结

20世纪20年代是乡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深入发展的阶段。清末民初新学与旧学的更替引起了各地宗族的震动,在乡族老广泛利用庙产、祠堂兴办教育,他们认为兴办新式学校,鼓励族中子弟学习是博取“功名”的又一种形式,他们把对科举考试的热情逐渐转移到新式教育上。江西吉安毛家祠堂明确规定有五类牌位不可以毁,其中第五类即接受新式教育并获得中学学历以上者牌位不可毁^[7]。可见获得新式学校文凭者亦被宗族所重视。

随着乡村教育、乡村建设运动的发展,作为新知识社团的一种,图书馆界开始关注乡村图书馆的建设问题。1924年,中华教育改进社第三届年会上,图书馆组提出《各县宜酌设农村图书馆案》,获大会通过,建议“各省署通知各县,就市乡

教育实业机关所在设立农村图书馆”，“由中华教育改进社陈请各地方政府通令施行”^[8]。但实际上乡村社会设立专门图书馆的情况却并不多见，原因在于，民众对于图书馆这种以笼统性“开启民智”为口号的自我学习空间的认同度不高，潜意识里认为图书馆缺乏明确的外部评价标准，比如缺乏像毕业文凭这样用来衡量“功名”的外在标志，因此也就不能与学校教育相提并论。乡村图书馆开展的社会教育常常因此陷入定位不明的状况，这是当时乡村图书馆很少单独存在，而主要作为学校附属设施或者主动兼及学校教育功能的重要原因。

最初，图书馆界主要期望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在乡村推广图书馆，还没有考虑到与乡村宗族合作办理，说明图书馆界对乡村图书馆事业的推广缺乏足够的认识。一方面，新知识社团常常把乡村社会原有的社会组织、公共空间视为落后无用、应当被淘汰的对象。如认为“乡村社会中的家族是封建余孽、‘桐城谬种’、鱼肉乡里的最后堡垒，行会是巧取豪夺、欺行霸市的代名词，民间借贷会则是对贫困农民抽血吸髓之所，说书的、卖唱的是低级趣味，而宗教组织则是麻痹民众、苟且偷生的‘万恶之藪’”^[9]。主张一概革除，代以他们所认为的新的社会组织，这种革新思想与一般民众思维格格不入，与乡村传统文化及既有利利益格局产生抵触，因此，依赖地方社会经济支持的乡村图书馆事业很难立足。例如“浙江某镇的农民，因着民众教育馆是以前龙王庙的旧址，日前大家将各村庙宇的佛像抬到镇上游行，每人手持长香，身披雨衣，三步一拜的求神祈雨。经过民教馆，有人回想着以前庙里有三尊菩萨，因着建筑民教馆而被毁的，于是天不下雨，就归咎于民教馆，大家将菩萨抬了进去，焚香祈祷，一面手持铁耙，将民教馆的讲台、阅报室、中山堂捣毁的一干二净。”^[10]由此可见，图书馆如果不能与当地乡村社会文化，特别是与宗族文化相结合，就很容易被边缘化，陷于举步维艰的状态。

在1929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届年会上，杨立诚的提案《设立乡村图书馆以为乡村社会之中

心案》就变得较为切合乡村社会实际，指出应“利用乡村之神庙祠宇僧舍为乡村图书馆设立地点。”^[11]1933年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届年会上，又有《建议中央通令各省于各宗祠内附设民众图书馆案》的专门议案，提出图书馆事业要与宗族文化结合的构想。理由是：“我国农民最多，每有聚族而居，各族皆有宗祠。祠产贫富不一，广东等省，有一祠而数十万者，并有祭祀之房屋，及故家大族之藏书，为创办图书馆最好资料。诚宜劝导酌设民众图书馆，就各宗祠状况，或独设或并立，以原有产业，为阖族之学术机关，就当地人才创办图书馆事业，则事半功倍，发展可期矣。”办法是：“1. 创设：由本协会建议中央通令各省市，劝导各宗祠设民众图书馆，由各县政府分别城乡，调查宗祠数目，及距离远近，或独设或合办。2. 经费与人才：A. 由宗祠自行议定，在收入项下拨出若干成举办图书馆。B. 办理人员，由各宗祠遴选。C. 经费与人才有不足时，则由地方图书馆尽量协作办理”^[12]。

可见，从寄希望于政府力量自上而下的开办图书馆，到立足于乡村社会以宗族力量开设民办乡村图书馆，图书馆界对乡村办馆模式的认识有了较大的变化，充分说明了在民国时期政府基层力量薄弱的情况下，乡村图书馆的建设更多地需要依靠本土力量，从而引发地方需求，而非以强制形式开展工作，这同时也就决定了乡村图书馆的建设具有自发性、不均衡的特点。

3 新知识社团与宗族文化的结合：司徒氏及关氏图书馆的建设

新知识社团与宗族并非截然两立的群体，新知识社团的部分成员来自宗族，但他们在乡村社会以外接受了新知识、新观念，眼界与在乡族人有很大的不同。民国初期及中期新知识社团对宗族的影响以及在乡族老日益加剧的危机感促进了图书馆的发展，使图书馆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宗族文化的新的象征。广东开平赤坎司徒氏图书馆及关氏图书馆的建设正是如此。

开平赤坎位于广东省江门市中南部,有潭江穿越,交通便利,是著名的侨乡,商品经济发达。司徒氏及关氏是该地的两大望族,司徒氏族人聚居于“三八墟”,关氏族人聚居在赤坎圩,司徒氏墟市居于东,称下埠,另名东埠;关氏居于西,称上埠,又名西埠,上下埠合称赤坎圩,双方历来矛盾不断,有着强烈的宗族竞争意识。司徒氏及关氏宗族在本地各建有“教伦堂”及“光裕堂”两大宗祠,各房又建有其他宗祠。基于维持望族地位的需要,两大宗族都有重视宗族文化教育的传统,关氏宗族“在前清时代,文风之盛几扼肇府,即入民国以来,学界之毕业于中学大学者,亦不乏人”^[13]。司徒氏宗族亦是如此,宗族设有专门管理文教事务的机构——十三甲族务委员会教育股,以图“统一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使教育机关成有系统的组织”^[14],说明当地文化教育风气是浓郁的。

清末民初乡村士绅管理职能衰退,而政府基层治理还不足以填补这一空缺,中国农村普遍经历了文化、经济、教育的衰退期。遍布乡村的烟馆、赌馆、妓院等不良社会娱乐场所严重戕害了青年子弟,败坏了社会风气,令在乡族老深感痛心,他们迫切希望以新文化、新娱乐替代萎靡不振的低俗娱乐,因此,建设图书馆以高尚的阅读文化涤除陋习,遂成为可供选择的社会教化方案,相应地,建设图书馆也从最初单方面的政府宣传变为了乡村士绅的一种内在的需求。图书馆虽然没有明确的“功名”价值,但因为其老少咸宜的特点、较低的专业性要求,以及集休闲娱乐、文化教育为一体的新社会公共空间受到新知识社团和在乡宗族的认可。比如开平地区的蚬冈圩启新通俗图书馆的创办人周梅羹、周斗垣、周裕芳等人,“受五四运动教育救国思潮之影响,目睹时艰,国弱民贫,认为强国富民,端赖发展文化教育,是以倡办启新通俗图书馆,以启民智,祈望科技救国,振兴中华”^[15]。不过当时大姓宗族尚未认识到兴办图书馆的好处,最初并未积极开展。因此开平最早的图书馆并非源自司徒氏或关氏宗族。1914年,开平塘口潭边院阅书报社、

蚬冈圩启新阅书报社在侨胞的资助下开办,各有图书数百册,订报纸、杂志数十份,设座位二十多个,初具规模,对民众开放,公开借阅,这是开平第一批民办的阅书报社。1916年开平百分兴礼义阅书报社开办。1919年,得侨胞资助,新建一座两层楼房,配有专人管理,公开开放,供民众自由阅览。此外另有塘口四九同安阅书报社(1918-1924)、楼冈冈陵阅书报社(1921)、赤坎护龙仁庆里五元阅书报社(1924)等相继开办^[16]。1923年,蚬冈启新周氏通俗图书馆诞生,附设在启新小学内。藏书有一万多册,内有《四库全书》《万有文库》《良友画报》《民国时报》《国华时报》《探海灯小报》和各种历史、科技、文艺小说等,共有报纸12份、杂志6份,书柜、书架、阅览桌椅齐全,设阅览座位30多个,开放时间是上午七时至下午六时^[17]。20世纪10至20年代宗族图书馆的萌芽,折射出地方宗族对图书馆这一新事物的渐进认同,反映了地方宗族通过兴建图书馆作为替代地方低俗娱乐的决心。

受到小姓宗族建设乡村图书馆风潮的影响,1920年,司徒氏宗族出资在赤坎下埠联兴街福音堂设立了一个阅览室,利用海外侨胞的捐款购置了一批书刊,开展借阅服务。族人及邑人反应踊跃,给海外的宗族乡亲极大的鼓舞。于是旅居美国、加拿大的华侨司徒懿慈、司徒懿衍、司徒章谋、司徒继敏、司徒宣业和旅居菲律宾的司徒有桥倡议要另辟新馆,得到在乡文化教育界人士及族老司徒育三、司徒子衡、司徒则唐、司徒有实、司徒抱一等响应,同时创办族刊《教伦月报》,加强宣传工作。1925年,司徒氏图书馆落成并举行了隆重的开馆仪式^{[2](12)}。司徒氏图书馆分三层,一楼是阅览室,二楼是书库、借书处和《教伦月报》编辑部,三楼为归国华侨俱乐部和会议室。当时藏书即有万余册,有《四库全书》《万有文库》等大型丛书,还有多种世界文学翻译本,并收集许多名人字画和珍贵文物,如司徒仲实捐赠的慈禧太后手书“龙”字条幅,司徒照当年殿试的试卷,美术家司徒槐赠送的巨幅油画,新加坡族侨司徒尚揖赠送的鳄鱼标本等^{[2](13)}。1926年,司徒氏旅加华侨

捐资在楼顶增建一座大钟楼,该钟是波士顿名牌产品。1934年,司徒氏旅美华侨捐资加建楼外院,院子正中加了间牌楼,两边各建一套间,红墙绿瓦,四檐滴水,颇为气派。此后,司徒育三又在院子中央建一座石山金鱼池,两侧空地种上名贵的竹和树。至此,占地810多平方米的司徒氏通俗图书馆基本完善^{[18](266-267)}。司徒氏图书馆集阅览、展览、会议、宗族月刊出版等多种功能为一体,形成了宗族新的生活文化中心。

司徒氏图书馆的成立大大刺激了关氏族人,使相对平衡的宗族竞争出现了新的不平衡。从社会需求而言,司徒氏通俗图书馆以及开平四处的图书馆、阅览室已经可以满足民众的阅览需要,并不需要在同一乡镇重复建设新的图书馆。但是,考虑到历史上的宗族纠葛,对关氏宗族来说,到司徒氏图书馆或者他姓宗族图书馆阅览,就意味着认同了他姓宗族的文化主导地位,等同于认同他姓宗族的地方社会影响力,这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因此,再建一所图书馆在关氏宗族看来仍然是十分必要的。

在关族图书馆正式奠基动工之前,对赤坎古镇两大家族发展现状已有切身感受的关国暖,在图书馆的建筑规模上有了新的想法,感觉原来的建设方案不足以反应关族在赤坎的影响,也不利于与司徒氏家族的竞争,规模偏小难以凝聚家族的民心,因此应当扩大规模,至少要基本上与司徒氏图书馆的建筑相当。这样,建筑预算就增加到四万元。1927年,负责与关国暖联系的关建勋来信传达了加拿大华侨的意见,并表示新筹集的款项随后汇回^[19]。虽然身居异国他乡,在外族人对于家族的建设依然关注,即便经济条件不算太好,对于家乡宗族竞赛的荣辱与共仍能促使他们慷慨解囊。

关氏族人遂组织“关族图书馆筹备委员会”,负责图书馆建设筹备事项。关族图书馆于1929年正式破土动工,建筑初期由关国暖从加拿大回国主持日常事务,他返回加拿大后,遂由熔翁负责监理此事。图书馆大楼由旅港族人建筑商关穆承造,为了保证楼房质量,所用材料都选用上

乘,历时两年落成。关族图书馆楼高三层,占地709.5平方米,一楼设阅览室,二楼为书库,三楼为会议厅。1931年关族图书馆开幕,藏书大约一万册,有《万有文库》《四库全书》《二十四史》三部大型丛书,放在三楼用特制书柜珍藏。建馆后,馆内图书设置逐渐充实,藏书达16000多册^{[18](272-273)}。

从建筑风格、功能布局以及藏书目录看,两馆颇为类似。作为后建的图书馆,关族图书馆在各个方面的对标司徒氏图书馆的设计。比如司徒氏图书馆邀请两位名人题写馆名,一楼正门横眉用云石刻书法家冯百砺所书的“司徒氏通俗图书馆”馆名;三楼顶正面书有“司徒氏图书馆”几个大字,为书法家谭延闿所书。关族图书馆也邀请两位名人题写馆名,正门馆名是广东著名书法家吴道熔的墨宝,钟楼正面“关族图书馆”为前清举人兴鸾玲的手迹。两馆在建筑上都不惜工本,都从国外购置豪华大钟,其华丽壮观程度是各地乡村图书馆所罕见的,甚至很多城市图书馆也不能与之相比。值得注意的是,关族图书馆并不因后建而试图超越司徒氏图书馆,而是谨慎地遵循了并驾齐驱的原则,以避免引起宗族竞赛的升级。由此,关族图书馆得以在各方面比肩司徒氏图书馆,从而产生了宗族间新的平衡。

4 宗族图书馆的影响

司徒氏图书馆及关氏图书馆的建设案例,反应出宗族上层新旧精英从分离到合流的历史过程。代表着新时代、新经济力量的新知识社团,与倚仗土地和功名所享有特权的在乡族老完成了宗族权力的交替,延缓了宗族的没落。宗祠的衰落一方面与它所依赖的社会条件的消失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与清末民初学术界和政府对宗族制度的大力批判有关。传统的宗祠是农耕时代的产物,是落后、腐朽的旧文化的象征。图书馆则代表着蒸蒸日上的新文化,它通过不断提供免费的公共产品,为宗族赢得声誉。又可以通过高大雄伟的建筑凸现相对于其他宗族的优越性,从而将宗

族感情寄托由祠堂转向图书馆,使图书馆成为宗族新的文化中心。另外,由于宗祠的建设是以血缘的亲疏形成的宗祠、支祠、家祠这样的结构,即使是同一宗族之间,也会因为血缘的远近之别,产生或明或暗的内部冲突,如此又形成宗族内部的新的等级区分,这种区分在宗族最重要的祭祀活动中得以充分体现。因此宗族发展越大,内部的分离趋势也就越明显,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增强了宗族的分离趋势。然而,宗族图书馆则是以宗族姓氏作为区分群体的标准,在这个标准下,所有的族人都是平等的,它没有宗祠传统的祭祀活动,也不涉及利益分配,因此部分改变了以往宗祠文化的弊端,增强了宗族内部的团结性。

宗族图书馆的建设与管理促成了新知识社团与在乡族人的相互联合,改变了离乡族人与在乡宗族联系日益松散的状况,增强了宗族的向心力。对于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族人而言,找到了新的情感寄托。司徒氏图书馆成立后,其董事会及图书馆维持会成员以海外华侨及侨眷居多,名誉董事遍布美洲、东南亚等十多个国家,图书馆成为离乡族人及在乡族人情感所系的物化象征。有学者认为,海外移民对家乡的文化馈赠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侨乡的文化发展。这些文化馈赠主要包括移民无偿贡献于家乡公共文化事业(包括学校、图书馆、宗祠、寺庙等)的行动^[20]。侨民在移居国与母国之间社会地位、经济收入的巨大差异,促成了离乡宗族对家乡公共事业的投资,而家乡则给予他们以前所未曾享有的荣誉和社会地位,称之为“社会地位补偿”^[21]。对于漂泊海外的离乡族人而言,虽然经济收入要高于故土,然而在海外大多处于社会的边缘。而在故土,他们则被视为新一代的宗族领袖,对宗族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这种强烈反差满足了他们对社会地位的渴求和心理预期,也极大地刺激了他们的社会责任感。正如20世纪20年代关树清在给关国暖的信中所称:“近闻本族图书馆行将鸠工兴筑,将来巍巍之楼现于赤坎,民智赖以开通,风俗赖以改良。公造益于本族,岂浅鲜哉,而公之名亦垂不朽矣”^[19]。此外司徒氏图书馆及关氏图书馆还

出版本族的刊物,对海外侨居地发行,通过“名誉补偿”产生对离乡宗族的吸引力。

5 余论

在中国近现代图书馆事业史研究中,宗族图书馆是较少涉及的方向。这可能是因为在民国时期,图书馆学专业出身的学者群体基本都在城市工作,鲜有从事乡村图书馆的经历。因此,相关问题的研究往往务虚,或者照搬西方模式评价中国乡村图书馆,这就使图书馆学术界对当时乡村图书馆的研究在整体上远离主流。而当时从事乡村图书馆事业实践较多的群体,主要是基督教会及乡村建设者们,他们对于乡村图书馆的认识是基于社会教育而非图书馆教育的角度,他们的实践远重于理论,又很少通过学术期刊等渠道公开发表观点。因此在当代以文献(尤其是公开文献)为据作历史考查时往往会忽视掉他们的存在。只有在查阅一些地方档案的时候,从当时的工作记录才会发现情况并非如此。加之两类群体的话语体系不同,表达上也互不跨界,因此作为乡村图书馆事业研究中的重要一支,宗族图书馆研究显得不怎么突出。但是,不能因为民国时期乡村图书馆特别是宗族图书馆问题研究不多而否认其重要性。在不少乡村建设运动开展较少的地区,宗族图书馆是公共图书馆意识在地化的重要成果。不可否认,宗族图书馆是民国时期乡村图书馆事业重要的一部分。

清末民初广东开平地区的乡村图书馆建设热潮还反映了一些有趣的问题。首先,图书馆界作为新知识社团的一部分,对乡村社会图书馆建设的认识是随着乡村教育运动的发展而萌发的,起初欲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实施,然而实践证明,政府深入基层社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抵消掉宗族的影响力。因此,转而依靠宗族兴办图书馆以避免“水土不服”遂成为切实可行的在地化方案。第二,在广东开平侨乡,清末民初离乡族人与在乡族老正在经历宗族控制的衰落阶段,离乡族人在异国他乡的边缘化处境所引起的思乡情,与在乡

族老目睹宗族管理功能衰退、社会风气败坏引起的焦虑有共情之处。在此背景下,建设图书馆以替代宗祠的文化中心地位是较理想的问题解决方案,由此加强了宗族情感的维系和联络。第三,图书馆建设成为宗族竞赛的新方式,司徒氏宗族和关氏宗族在又一轮竞赛中找到了新的平衡,在客观上促成了乡村图书馆的推广,并成为宗族精神的新象征。

参考文献

- 1 桑兵. 清末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4: 自序.
- 2 席婷婷. 赤坎宗族图书馆研究[D]. 广州: 中山大学, 2011.
- 3 圣谕广训十六条注解[OL]. <http://www.360doc.cn/mip/765219991.html>.
- 4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编. 冯尔康文集清代宗族史论[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9: 140.
- 5 林耀华. 义序的宗族研究[M]. 北京: 生活·新知·三联书店, 2000: 29.
- 6 丁钢. 近世中国经济生活与宗族教育[M].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6: 129.
- 7 葛孝亿. 社会流动的教育机制探究: 以一个地方家族为中心(1905-2010)[D].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 2014: 140.
- 8 第三届年会议决案, 图书馆教育组: 各省宜酌设农村图书馆, 由本社建议各省署通飭各县. 新教育[J], 1924(3): 663-664, 694.
- 9 周慧梅. 近代民众教育馆研究[M]. 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2012: 282.
- 10 杭州通讯[N]. 大公报, 1934-07-04.
- 11 杨立诚. 设立乡村图书馆以为乡村社会之中心案[C].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一届年会报告. 北京: 中华图书馆协会理事会, 1929: 137-138.
- 12 建议中央通令各省于各宗祠内附设民众图书馆案[C]. 中华图书馆协会第二届年会报告, 1933: 39-40.
- 13 本族教育统一之我见[J]. 光裕月刊, 1920-01-01(12).
- 14 邓玉柱. 侨乡宗族文教活动管窥——以开平县司徒氏为例[J]. 文教资料, 2013(13): 106.
- 15 吴蜀红, 周群. 近代五邑地区民间图书馆探究[J]. 图书馆论坛, 2009(2): 39.
- 16 周学东, 潘焕棠, 关辉. 开平的图书馆事业[J]. 开平文史(第19辑), 1988(1): 40-51.
- 17 周松克. 蚬冈圩启新通俗图书馆馆史[J]. 开平文史(第11辑), 1986: 28.
- 18 王曙星主编. 江门好[M]. 广州: 广东经济出版社, 1999.
- 19 张国雄, 李玉祥. 赤坎古镇[M].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4: 74.
- 20 黎相宜, 周敏. 跨国实践中的社会地位补偿——华南侨乡两个移民群体文化馈赠的比较研究[J]. 社会学研究, 2012(3): 183-185.
- 21 黎相宜, 陈杰. 社会地位补偿与海外移民捐赠——广东五邑侨乡与海南文昌侨乡的比较分析. 华人华侨历史研究[J]. 2011(4): 7.

(任家乐 研究员 成都大学期刊中心副主任)

收稿日期: 2021-04-07